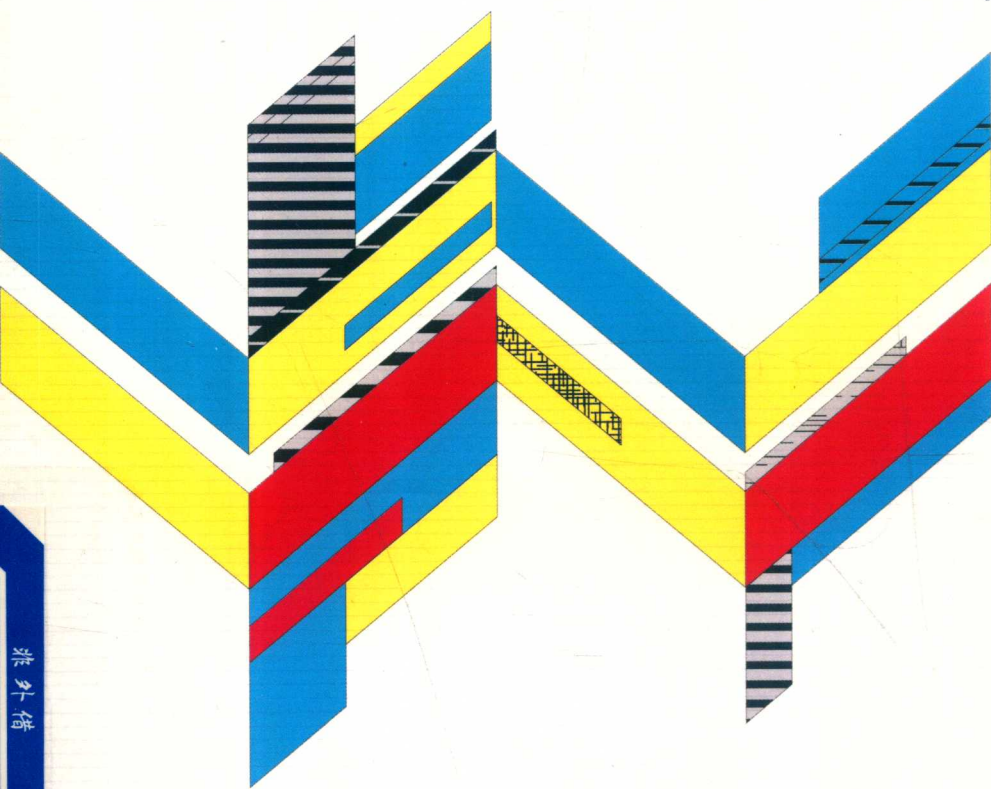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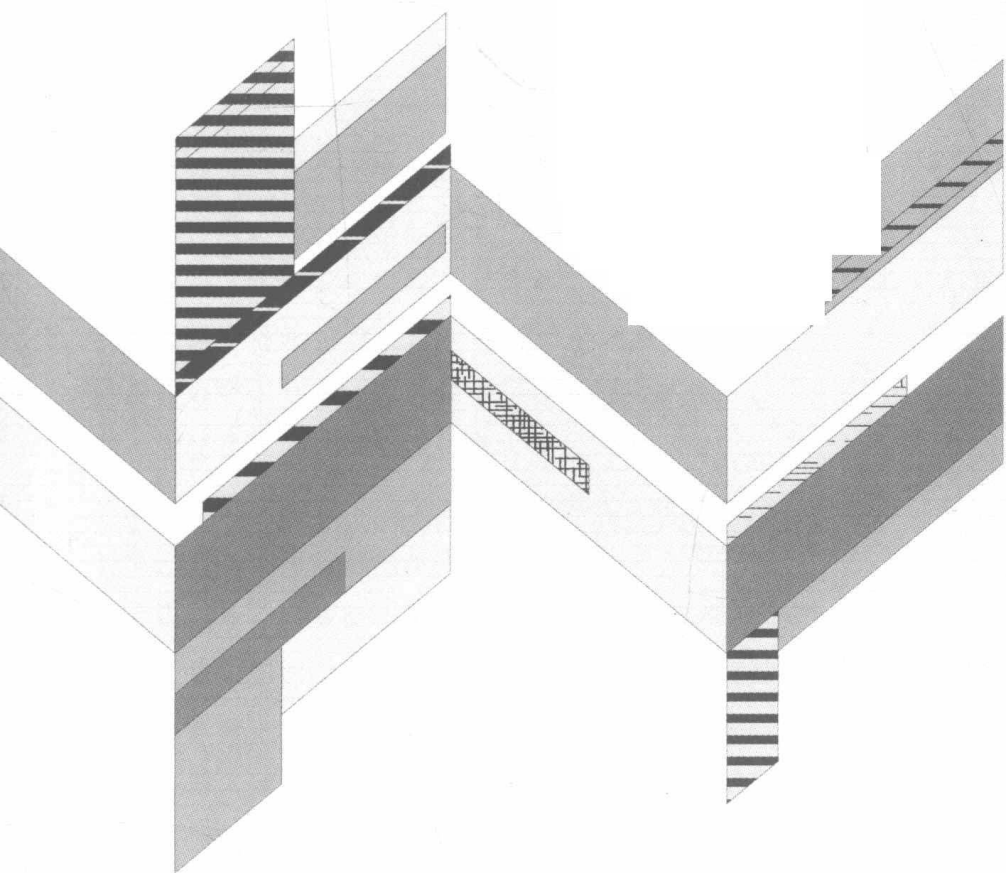
张景华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张景华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 张景华著. — 湘潭 :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687-0145-7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翻译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775号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与反思

DANGDAI XIFANG FANYI LILUN DE JIEJIAN YU FANSI

张景华 著

责任编辑: 刘文情

封面设计: 张 波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电 话: 0731-58298960 0731-58298966 (传真)

邮 编: 411105

网 址: <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7-0145-7

定 价: 36.00 元

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自序

青春已逝，年华易老。今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触动了许多人的泪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兵的生活真的是如诉如歌，有欢笑、有眼泪，有动听的歌声，有曼妙的舞蹈，有梦想和现实的冲突。《芳华》让我叹息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已年逾不惑。在提笔写序时，我猛然发现自己从发表第一篇论文起到现在已经有十五年了，本书的文章也恰好选了十五篇，这让我联想起李商隐《锦瑟》中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在翻译研究的学术史上，我这些文章也许不见经传，但是它们至少见证了我的芳华，见证了我的翻译研究经历。

我的学术研究起步于社会转型时代，翻译研究同样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转型，首先是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范式向“文化转向”，其次是结构主义译论向后现代译论的转型。这还得从我的研究生教育说起，1999年在川外读研时，给我们讲授翻译理论的是廖七一教授，他从英国完成访学后带回了许多西方翻译理论的原版文献，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毕业论文，他都鼓励学生积极探讨西方译论，积极接受新知识，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都是关联理论，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关联理论的局限性，而转向文化范式和后现代译论。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下，西方译论由于其观点独特常被视为“怪胎”，在学术会议中或多或少会招来误解或批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译论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那些批评者也逐渐加入研究西方译论的队伍。

2005年至2008年我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在崔永禄教授的

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并翻译出版了《译者的隐形》，博士研究生教育算是系统地深入研究了一种翻译理论，基本掌握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方法。在这十余年间，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译论在学理上缺少西方翻译理论的跨学科性和系统性，因而自己的学术研究必须要向西方学习。我虽间或涉猎中国近代翻译史，但大部分时间徜徉在西方译学的海洋里，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学术语境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经过二十余年对西方译学的输入，中国译学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当今的西方译学界已经无法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呼唤本土理论、呼唤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我将研究兴趣逐渐转向近代中国西学翻译史。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卸下包袱，再一次出发。我的翻译研究重点虽然从西方译学转向本土问题，但是，学习西方翻译理论也让本人深深地领悟到：要从事翻译研究，要提出某种理论，都必须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渊博的跨学科知识。研究西方译论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翻译理论，而是在充分了解西方的翻译传统、哲学思想和翻译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在进一步深入思考各种翻译理论的学术背景、梳理其思想谱系的基础上，揭示和发现各种理论在学术思想上的传承与超越，然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在英汉互译实践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基于这种思考，我将近二十年来的学习心得和相关论文整理成集，算是对我前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总结，本书的读者主要针对刚入门的翻译研究者，期望这些读者可以通过本书略窥西方翻译研究的门径，或基本了解在中国语境下如何做好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因此本书主要分为解读阐发、分析应用和反思批判三个部分，共十五篇论文。从本人2003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恰好十五年，可以说本书凝聚了笔者十五年来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心得体会。

回顾十五年来的学术研究，我首先要感谢学术道路上给我帮助的学者们，他们的提携、鼓励、批评和帮助使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然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外国语文》《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等杂志，是这些杂志让我有出头露面机会，使我能从学术研究中多少能找到些许成就感。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工作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这里重视学术研

究，有浓厚的学术氛围；感谢外国语学院前院长曾艳钰教授，十五年来是她带领我在工作上不辞劳苦，在学术上攻坚克难。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朋友们和同事们，是他们让我在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中找到了乐趣，不知不觉度过了十五年。

与《芳华》中的人物比较，我没有历史的创伤、战争的痛苦。我有幸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政治动荡的年代，读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虽然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但还算顺利，可是自我感觉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忆的事情，因此将过去的论文收录成集，算是给自己留下一点回忆。

2018年7月20日

目 录

导 论	如何借鉴和反思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1)
-----	------------------------	-----

上篇 解读阐发

第一章	关联理论的翻译本体论阐释	(23)
第二章	新历史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8)
第三章	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身份构建问题	(49)
第四章	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	(61)
第五章	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伦理	(76)

中篇 分析应用

第六章	从关联理论解读汉语习语的可译性	(91)
第七章	从文学翻译的倾向性论复译的必要性	(101)
第八章	叙事学对小说翻译批评的适用性及其拓展	(111)
第九章	改造国民性与译者的主体性	(122)
第十章	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批评	(134)

下篇 反思批判

第十一章 反常翻译观的解读与批判 (149)

第十二章 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伦理观的批判性反思 (159)

第十三章 关于当前翻译论争的元伦理学反思 (168)

第十四章 庞德的翻译是东方主义吗? (177)

第十五章 论翻译暴力的学理依据及其研究价值 (190)

导 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翻译研究与文学、语言学、符号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相互借鉴,这不仅为翻译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翻译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西方翻译研究的理论范式不断更迭,各种理论流派相互交锋,此消彼长。除了传统语文学学派和语言学学派之外,还有二十一世纪所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西方翻译理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语文学派代表人物有德莱顿(J. Dryden)和泰特勒(F. Tytler)等;诠释学派有斯坦纳(G. Steiner),施莱尔玛赫(F. Schleiermacher)等;语言学派有奈达(E. Nida)、纽马克(P. Newmark)等;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勒弗维尔(A. Lefevere)、巴斯奈特(S. Bassnett)等;解构学派的代表人物德里达(J. Derrida)和德曼(de Man);目的论者弗美尔(H. Vermeer)和诺德(C. Nord);还有描写学派的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及图里(G. Toury)等。要借鉴和反思西方翻译理论,必须对西方翻译传统、哲学基础和理论范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本书在导论中先对此予以简要的介绍,然后分为解读阐发、分析应用、反思批判三大部分详述。

一、西方翻译传统的三种模式

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探讨,不能脱离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传统,而对其翻译传统的了解则必须对其翻译史有所了解。和中国的一样,西方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最早的译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著名的《圣经·旧约》,即《七十二子希腊文本圣经》;罗马学者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了希腊的荷马史诗。对于西方翻译历史传

统的划分,谭载喜(2004)将其分为六个时期:(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对于西方的翻译传统的描述,采用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1990)的划分,并借鉴其部分观点,结合本人对西方翻译理论和史料的研读和理解,介绍西方翻译传统中的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

(一) 哲罗姆模式

在当代西方译论中,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始终是翻译研究绕不过的门槛,“对等”也一直是翻译研究的关键词,对等论的代表人物奈达也因倡导“动态对等”而声名鹊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可以说到了“译必称奈达”地步。就对等论而言,翻译即译义,其要旨是忠实,忠实传统还得从哲罗姆模式谈起。哲罗姆(S. Jerome,约公元331~420年)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拉丁文学,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受罗马教皇之命修改《拉西圣经》,译作有《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其翻译理论散见于《致帕马丘的信》(*Letter to Pammachius*)和译文序言中,他说:“我现在不仅承认而且还要宣布,在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我不是逐字对译,而是以意译意。当然,《圣经》的翻译例外,因为《圣经》中的句法都包含着神秘的意义。”他还说:“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像穿着外套一样隐藏了原来的意思,正如茂盛的草抑制了作物的生长。措辞服从于语法和修辞,翻译的措辞得绕弯子才能讲清寥寥数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我的译文绝非逐字翻译,我保留原文的意思。”这些话体现了哲罗姆所坚持的主要观点:(1)翻译的可译性程度受语言和文化的制约,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应,而须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2)翻译应该关注整体意义,包括整体风格的传达,而不是简单的字词对应。(3)翻译应该考虑文本功能,要区别对待宗教翻译与世俗翻译,世俗翻译可以采取意译法,而《圣经》翻译必须直译,因为《圣经》中的句法结构蕴含神秘意义而不能更改。

哲罗姆虽然强调要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但是,忠实始终是其翻译思想的核心。因为在翻译《圣经》过程中,原作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原作也始终是翻译活动的中心,《圣经》的翻译要求译者绝对忠实,忠实也是翻译

的理想，早期的《圣经》翻译盛行隔行翻译法，基本上保持字句对应，译文与原文严格对照。事实上，译文与原文的隔行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做到字句对应的，但是为了体现对原文的忠实，即使这样的翻译会造成句法生硬，甚至无法卒读，译者也坚持隔行翻译法。这种翻译方法不仅适用于《圣经》的翻译，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类型的文本。为了忠实，翻译家们围绕与忠实相关的种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译者也为忠实问题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可以说《圣经》的翻译促成了忠实概念的神圣化，忠实成了超越时间和超越空间的翻译理想，奈达的对等论可以说是哲罗姆模式的延续，因为奈达的对等论也是建立在《圣经》的翻译经验之上的。忠实的韵律化其实忽视了翻译的复杂性，把翻译作为一种纯语言转换行为，忽略了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

随着社会和历史的演变，基督教的影响在西方社会逐渐式微，《圣经》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地位，人们对翻译的理解也逐渐摆脱了“忠实/自由”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思考翻译的对等。翻译的对等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词语对应，而是在特定语境下的策略选择。译作不是在真空中产生，也不是在真空中接受。忠实只能是特定语境下的忠实，对等也只能是特定语境下的对等。忠实有很多类型的忠实，既需要考虑忠实的对象，也需要考虑忠实的情境。翻译的忠实和对等是否要考虑在目标语境下译作能发挥什么作用？翻译的忠实和对等是否要考虑文本类型的差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是否对翻译的忠实和对等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使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语境要素对翻译的影响：其一是语言语境、其二是文化语境、其三是历史语境。这三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交错，使翻译的忠实和对等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贺拉斯模式

除了最有影响力的哲罗姆模式之外，著名的诗人贺拉斯（Q. Horatius，公元前65年~公元8年）的翻译思想在西方翻译传统中也有较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历史渊源来看，贺拉斯模式比哲罗姆模式更悠久。尽管贺拉斯的翻译思想深奥难懂，但其翻译论述被广为引用。贺拉斯对翻译的论述散见于其名著《诗艺》。贺拉斯主张活译，其观点集中于“忠实的翻译”（*fidus interpres*）这一概念。与哲罗姆的观点不同，贺拉斯的“忠实翻译”，其对象并非文本，而是“委托人”（*client*）。贺拉斯认为忠实的笔译者/口译者是

人所信任的，他按时完成任务，让双方都能满意。要做到这一点，口译者要在委托人之间用两种语言来协商；如果是笔译的话，译者要在客户和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斡旋。斡旋决定翻译的成败，传统的忠实并不能保证斡旋的成败。也就是说，笔译者和口译者有时“不太”忠实的翻译反而能促成斡旋的成功。与哲罗姆不同，他认为要灵活翻译，翻译并不意味着原文神圣不可侵犯，翻译的关键是要忠于“委托人”，为委托人服务是翻译的终极目标。翻译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事实上我们从贺拉斯的论述中可以找到当今翻译目的论的依据。贺拉斯还发现翻译中存在“优势语言”（privileged language），在贺拉斯所生活的年代，拉丁文就是优势语言。翻译的斡旋最终往往偏向特权语言，斡旋不可能绝对平等。在当今的翻译和文化交流中英语是优势语言，将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时，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偏向英语，所有外国的、异域的语言文化要素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标准化了。在翻译中优势语言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先进思想、高级技术、教育手段、文化思想向欠发达地区的传播，但不利于保护弱势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弱势民族语言文化可能在翻译中被同化。

贺拉斯翻译论述虽然历史久远，言简意赅，却从一定程度上与纽马克等当代翻译理论家的学术观点不谋而合。从当代译学来看，贺拉斯的翻译论述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文本类型与翻译的联系，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有些文本的目标是为了传递信息，那么翻译的斡旋应该尽可能传递信息；有些文本的目标是为了创造商业价值，那么翻译的斡旋就应该以商业价值为取向。对优势语言的论述说明贺拉斯认识到文化资本与翻译的联系，语言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媒介，拉丁文的优势地位决定了是否掌握拉丁文与文化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联系，而且翻译流向也主要是将拉丁文翻译成其他语言。从贺拉斯模式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一部翻译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翻译与文化互动的历史。所以，研究翻译史就不能不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就必须研究其思想史和文化史。

（三）施莱尔马赫模式

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 1768 ~ 1843 年），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其父为敬虔派背景的摩拉维亚派（Moravian）牧师。施莱尔马赫曾在哈利大学（Halle）学习，深受康德哲学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施莱尔马赫最著名的翻译论述是在 1813 年发表的《论不同的翻译方法》（Ue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Uebersetzens) 的演讲,他指出翻译只存在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两种方法可谓完全迥异,译者采用其中之一时必须严格遵守。若将两者混合,则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作者与读者可因此而终不得相见。

从当代译学来看,施莱尔马赫把翻译分为两类:其一是异化翻译。译者站在源语文化的立场上让目的语读者通过译文更多地了解源语文化及其特色,其二是归化翻译。译者站在目的语读者的立场上对源语文化或原文内容进行改造,消除源语文化的异质性,目的是让译文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施莱尔马赫模式赞成异化翻译,强调翻译应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这种分类突破了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尽管异化翻译的译文有时候并不十分流畅,但是异化翻译可以拓展和丰富目的语。施莱尔马赫坚持译者只能在两种翻译策略中做出选择。

从伦理学来看,施莱尔马赫开创了一套有关“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翻译伦理,让人们思考道德主体与物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道德主体与物理主体相似,因此道德立场就像现实立场,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支持两种道德立场,翻译也只有一种道德立场。其实,施莱尔马赫也并非异化翻译的首倡者,歌德等浪漫主义翻译家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只不过是更为明确且更为极端地阐发了这种翻译观,浪漫主义早就对翻译伦理达成了共识:在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影响下的异化翻译,主要沿袭了希腊文的翻译传统;而法国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翻译强调“美丽的不忠实”(les belles infidels)和译文的“自然”,主要沿袭了拉丁文的翻译传统。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观,他在施莱尔马赫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阐发,形成了系统的异化翻译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译学的发展。

在西方翻译传统中,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每一种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中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在翻译教学的初期,通常采用哲罗姆模式,因为这一模式能检查学生对母语和外语的熟练程度,评估学生对词汇、语法和句法的驾驭能力。但是,在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进行翻译的情况下,比如说计算机指南、旅游手册、广告、医药、法律文本的翻译,为达到服务“委托人”的目的,译者的翻译策略通常考虑贺拉斯模式,这就是根据特定的情境采取特定斡旋策略。如果在考虑文化资本的情况下,比如说经典文本的翻译,贺拉斯模式则更有说服力,因为译

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总是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贺拉斯模式的缺陷是他发现了翻译中的优势语言问题，却没有提出相应的对策，而施莱尔马赫模式的优势是他提出翻译不能单纯考虑文化控制和文化顺应，翻译还应该考虑文化抵抗。

二、西方翻译理论与西方哲学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形成不仅与其翻译传统相关，而且与其丰富多样的哲学传统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和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一样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且翻译研究本身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与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一是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思想家运用翻译作为案例或隐喻思考哲学问题；二是很多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都运用哲学话语作为其理论或实践的依据；三是很多学者、哲学家和翻译家都讨论过哲学文本的翻译。

（一）西方哲学与翻译理论的演化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话语中并没有专门关于翻译的论述，事实上，在西方哲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翻译”这个词也很少作为专业术语出现。其原因是在西方历史上，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出现和传播经常会招致政治风险，哲学家并没有多少权力。基督教在西方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在早期的西方翻译理论中，《圣经》的翻译使拉丁文居于优势语言的地位，有关翻译的论述充斥着大量贬抑翻译的话语，把翻译比喻为媒婆、渡船、仆人、奴隶等类似的论述。一直到文艺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欧洲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翻译的地位才得到改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归功于德国浪漫主义。

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洪堡特（W. Humbolt）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概念组合构成了特定的世界观，语言同时也是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因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特色，翻译必须面对语言和文化差异，所以理想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基于这样的共识，施莱尔马赫等浪漫派人物强调异化翻译高于归化翻译，认为翻译读起来要像翻译，那种把翻译与目的语非翻译文本混淆的做法其实是错误的，对于施勒格尔（F. Schlegel）来说，翻译的价值就在于其承载了语言和文化的异质性。异

化翻译的意义就在于这种翻译可以丰富德语的词汇、语法和句法，可以推动德国文化的发展。德国浪漫主义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翻译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和一种独特的体裁；另一方面，对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分类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奠定了基础。

德国浪漫主义还为阐释学翻译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让人们重新思考源语文本和原文作者，重新思考翻译的解释性本质，从而意识到对于原文的理解有时候可能存在多种解读，翻译也有可能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这样原作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就值得怀疑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阐释学思想成为当代阐释学的基础，与胡塞尔（E. Husserl）、海德格尔（M. Heidegger）伽达默尔（H. Gadamer）等阐释学派人物的思想一脉相承。由于翻译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翻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哲学家的视野，海德格尔是较早将翻译作为哲学探索模式的哲学家之一，他翻译的兴趣不仅是因为翻译解释的多样性，更因为语言的本质，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存在。本雅明（W. Benjamin）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在《译者的天职》（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指出，每一种语言本身就是花瓶的碎片，译者的工作就是把各种意义的碎片拼接起来，恢复花瓶的美丽和图案。当代阐释学翻译观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的解读，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原作，所有的翻译或多或少会改变原文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在各种各样的解读行为中“偏见”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偏见也是积极的，偏见表明了译者积极参与对原文的解读，这样翻译便成了具有创造性的行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阐释学译论的发展反映了译学界对翻译的确定性表示怀疑，事实上，这种怀疑反复出现在各种当代翻译理论中，尤其是以德里达（J. Derrida）为代表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译论。翻译研究从规定性研究向描写性研究的发展也表明这种趋势，描写学派采取一种实证主义态度，重点分析翻译产品而不分析翻译过程，关注翻译的事实而不是理想的翻译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翻译解读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对翻译确定性的怀疑根源于美国分析性哲学传统，1959年蒯因（W. Quine）出版了论文《翻译与意义》，对于意义问题的思考他吸收了行为主义理论，并运用分析性哲学寻求一种逻辑性的答案，研究的结果使他对意义的确定性持怀疑主义态度。蒯因把翻译作为一种思维实验，证明普遍的认识论原则。他提出“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概念，假定在两种从未接触的文化之间进行翻译，比如说兔子跑过来的时候，土著人说“Ga-

vagai”，语言学家将这一术语解读为“兔子”，或“看，兔子”，或“兔子跑了”，蒯因通过研究和分析发现，语言学家始终无法确定“Gavagai”的准确含义，因此他认为翻译也无法保证绝对的确定性。

如果说分析性哲学动摇了翻译的确定性，那么可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兴起的解构主义彻底消解了原作的权威，否定了翻译的确定性。传统翻译观认为文本是作者自我抒发感情的场所，作者享有对文本的绝对权威，而翻译只是对原作的模仿，从而在伦理道德上将翻译置于原作的从属地位。翻译批评也一直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照，任何对原文的偏离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解构主义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手段来颠覆这一伦理。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R. Barthes）曾宣称“作者死了”，因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语言符号来解读文本的意义，文本能否继续生存就取决于读者，所以文本没有任何中心意义。在巴特看来，文本既无中心系统，也没有终极的意义。文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作者也无法限制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解释了。

解构主义把巴特的文本观亦引入翻译研究，认为原文与译文不是原创与摹本的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按德利达的说法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传统译论一般以“原文—译文”的二元结构为基础，而解构主义却否认原文与译文的绝对界限，也否认语言与意义的绝对区分。德利达认为，在翻译中所呈现的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指向外在的现实，而是指向语言本身。因此，译文是对先前的文本的翻译，先前的文本又是更早的文本的翻译，如此向前直至无限，即成为德利达所说的所谓“无限回归的意义链”。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不同的“意义链”，也就是说一切文本皆是互文本，原作本身也是一个无数的互文本构成，这样也就否定了原作与译作的界限。

对于翻译解读的多样性，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哲学刮起了新历史主义思潮，新历史主义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消解了客观唯一的解释观，消解了翻译的确定性，突破了结构主义翻译研究的非历史倾向，打破了规定性的翻译标准，认为翻译随历史语境的转变而变化，强调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因为翻译也有一定的创造性；对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强调文本的“断裂”，消解原作的绝对权威。新历史主义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学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阐释学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的发展，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译论风起云涌，蓬勃发展。